



红色土地上的不变初心

革命老区井冈山和延安脱贫启示录



井冈山和宝塔山，一南一北，因一条二万五千里长的红飘带紧紧连在了一起。今日两地，绿意葱茏，早已“旧貌换新颜”。

旅游旺季来临，50岁出头的农家乐老板彭夏英变得更忙了。这位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曾经的贫困户家里，一拨拨游客接踵而至。不远处，她的笑容被定格在村中心的一面“笑脸墙”上，与“神山梦”“小康梦”“中国梦”三块木牌相互映衬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1600多公里之外，延安安塞区“80后”青年赵洋洋也在鹿舍里忙碌，身旁的梅花鹿膘肥体健。刚刚摘下贫困帽的年轻人雄心勃勃，计划着用互联网把鹿茸产品卖出大山。

看似并无交集的两个人，命运之变的背后，映照着同一曲奋进的时代凯歌。

2017年2月，革命摇篮井冈山在全国率先宣布脱贫“摘帽”；2019年5月，革命圣地延安整体告别绝对贫困。

从井冈山到宝塔山，两片红色土地的脱贫之路，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。

不忘初心：“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”

井冈山，中国革命的摇篮。1927年，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，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。延安，中国革命的圣地。党中央前后13年以延安为中心领导全国革命。

“我们要永远珍惜、永远铭记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”“把老区发展和老区人民生活改善时刻放在心上、抓在手上”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。

党中央从没忘记！井冈山与延安等老区先后脱贫，中国共产党人忠实践行“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”的庄严承诺。

盛夏已至，延安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。“党的政策不得了，建起大棚有医保，娃娃们的烦恼没有了……”

坐在搬入的新家，延安吴起县脱贫户张春振自编的信天游唱得响亮。拉着记者的手，憨厚的陕北汉子算起账来，止不住感叹：修两座大棚政府补贴10万元，做手术报销6万元，还有安置房、教育

补贴、公益性岗位收入……

透过窗口向外望去，吴起胜利山上游人如织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高耸入云。84年前，一支肩负着民族救亡使命的队伍落脚于此，开启了一段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征程。

时光荏苒，在这支队伍曾经战斗的地方，如今处处换了模样。

高耸的门楼、宽敞的村道，咖啡屋、小吃铺……走进井冈山大陇镇大陇村，人们被眼前的场景深深吸引。

90多年前，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，红军在大陇村开办了第一个红色墟场，设立公卖处，收购农民的土特产，向他们出售平价食盐、药材等生活必需品。

90多年后的脱贫攻坚中，大陇村成立旅游公司发展乡村旅游。距昔日公卖处不远，一家新公卖处又开起来了，曾在外打工的“90后”张春华成了这里的售货员。她说：“游客越来越多，山货土货都成了抢手货，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！”

站在历史发生地回望历史，来时的路会看得愈发清晰。

井冈山朱砂冲林场行洲村一栋古朴的老宅前，时光仿佛凝固。

房檐下，单字一尺见方的标语——“红军是为劳苦工农谋利益的先锋队”，虽历经风雨，仍清晰可见。这是在革命战争年代，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初心和使命朴素概括。

“加快老区发展步伐，做好老区扶贫开发工作，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，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，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。”

这是在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里，中国共产党人的郑重承诺。

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谭虎娃说，坚持党的领导，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，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证。革命老区陆续脱贫，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。

从井冈山到延安，党旗始终高擎在脱贫攻坚的最前线。

“我们选派了112名扶贫第一书记，3000多名党员干部驻村帮扶。”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，正是在党的领导下，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“摘帽”，取得脱贫攻坚战的首场胜利！”

脱贫后，井冈山厦坪镇厦坪村第一书记谢冰每月仍有20多天吃住在村里。他说：“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乡亲们刚脱贫，还要送一程。”

1784名干部驻村担任第一书记，1546个驻村工作队直插一线，3.74万名干部开展联户包

扶……在延安，告别绝对贫困后，干部们没有松口气，仍扎根于山山峁峁之间。

“党的领导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，也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制胜法宝。”延安市委负责人说，唯有不忘初心，方可告慰革命先辈，才能继续一往无前。

永远的使命：一切为了人民，一切依靠人民

数十年来，井冈山山市从“人口不满两千，产谷不满万担”、只有5条羊肠小道的穷乡僻壤起步，建成了国家5A级旅游风景区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；延安市的贫困村全部退出，贫困发生率降至0.66%，从沟壑纵横、生态脆弱、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”变成了国家森林城市、卫生城市和优秀旅游城市。沧桑巨变的背后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担当和勇气。

每天，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的黄洋界都会迎来许多游客。

这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——黄洋界保卫战的发生地。90多年前，敌人以近6000人的兵力来犯，妄图一举打开根据地的门户。此时，保卫黄洋界的是红军31团的两个连，不足300人，且武器弹药匮乏。

“力量对比如此悬殊，红军为什么能够赢得这场战斗？”不少游客问。“答案就在于党和红军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，充分发动群众，筑成了一道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。”讲解员张鑫回答道。

无论时光流转，始终依靠人民，一切为了人民，是共产党人不变的本色。

延安宜川县云岩镇庄头村的王建峰一度灰心丧气。中年丧妻，住在老旧的窑洞里，还要供两个女儿上大学，生活的重负将这个汉子压得喘不过气来。镇党委书记马伟伟第一次上门，他“几盆冷水”就泼了上去：“穷了半辈子，谁也没办法，你回去吧！”

3年后，记者再见王建峰，已是在他的新房内。在马伟伟耐心地帮扶下，王建峰的两个女儿得到教育扶贫资助，顺利完成学业。靠着政府提供的3.58万元帮扶资金，他盖起了3间砖瓦房。镇里联系技术员手把手指导果园管理，找来客商上门收购。马伟伟还帮王建峰找工作，这位曾经的“金牌厨师”再次上岗。

“如果不是党员干部们一次次上门帮我解决困难，我咋能过上这样的光景！”如今的王建峰扬起了信心的风帆。他说，党和政府给了太多太多，剩下的，就得靠自己的奋斗！

千里之外，与王建峰素不相识的吴云月，也

发出了同样的感慨。

在井冈山茅坪乡坝上村，吴云月一大早便起床准备“红军餐”。早年丧偶后，她含辛茹苦将儿子抚养成人。后来，乘着脱贫攻坚的春风，她积极参与村里“红军的一天”培训接待，去年纯收入达1.5万元。每当干部走访，吴云月总是这样乐呵呵说道：党和政府给了我那么多帮助，但我不能什么都指望政府，自己也得努力才行！

“党员帮、群众干，脱贫致富能实现。”在井冈山和延安，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话。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甘苦，一起用汗水浇灌出了红彤彤的光景。

从泰丰高速出口进入井冈山的道路两旁，九丰农业博览园、灵芝产业园、九黄桃合作社、猕猴桃基地等依次铺开，一条现代农业产业带渐成规模。

这里的老表们说，过去井冈山的干部最爱问三个问题：GDP增加多少、财政收入实现多少、固定资产投资了多少。现在成了“新三问”：村集体经济收入如何、农民人均纯收入如何、贫困发生率如何。

考虑问题的角度变了，不变的是一切为了群众的真挚情怀。

“牢牢依靠人民，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，是老区脱贫的重要启示。”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王涛说，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，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，党带领老区人民群众啃下了脱贫攻坚的“硬骨头”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。

信仰的力量：既是精神家园，更是美丽幸福家园

行走在井冈山，人们常会看到一群身着红军服、头戴红军帽的人在蜿蜒山路上有序行军，在烈士墓前深情缅怀……许多前来参观学习的人说，在井冈山，他们感受到一次次心灵的震撼，经历了一番精神的洗礼。

来自航天九院一六五厂的一位学员说：“90多年前，正因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，中国共产党才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战胜一切困难。今天，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，理想信念依然是照亮前路的灯、把准航向的舵。”

凤凰山的窑洞外，杨家岭的党旗下，为人民服务广场张思德烈士的雕像前……同样的心声也在延安激荡。

这是一个颇为特殊的课堂。延川县永坪镇赵家河村的知青林下，来自陕西各地的48名“80后”处级干部正在学习充电。

新华社南宁7月4日电(记者王念、卢婵婷、徐海涛)靠种芒果和林下养鸡，广西百色市田阳县百育镇四那村坳忙屯村民潘克坤实现了致富，2013年主动申请入党。成为正式党员后，他带领屯里20多户村民养“芒香”鸡，1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由此脱贫。

革命老区百色是广西脱贫攻坚主战场。近年来，百色大力发展农村经济，实施“争创五旗”活动，打造强有力的村级党组织；同时实施“头雁引领”“先锋示范”工程，增强农村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带动作用，取得明显效果。2018年，全市4个县脱贫摘帽，农民人均纯收入升至11086元。

率先垂范 做好“头雁”

一阵夏雨过后，凌云县下甲镇平怀村一些村民赶紧下地采桑，第五批蚕茧很快就要上市了。

“按照目前市场价，这批蚕茧能卖100多万元。”村党支部书记郁再俭是村桑蚕产业带头人，在他的带领下，村里打造出“桑蚕+食用菌+有机肥+桑蚕制品+豚理养殖”的循环产业链，户均增收逾万元，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富裕村、生态示范村。

几年前，郁再俭刚提出种桑养蚕的想法时，村民一片质疑。“我是村干部，如果承诺的事做不到，那别人怎么看待党员、怎么相信村‘两委’？”郁再俭发动更多的党员加入产业发展，并成立种桑养蚕专业合作社党支部。看到种桑养蚕效益越来越好，村民不断加入进来。

乐业县同乐镇达存村产业曾是空白，村党支部书记周秀义和村干部经过调研，选定猕猴桃作为全村的脱贫产业，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8000亩土地流转，3个月内全部种上果苗。“只有办实事，才能在群众心里有分量。”周秀义说。

“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基层党员干部的带动。”百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欧阳天干说，百色实施“头雁引领”“先锋示范”等工程，就是扶持党员成为产业发展带头人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夯实脱贫攻坚的硬支撑。

“领办”实体 激活动力

如何推动基层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、让村党组织有战斗力？

2015年底，百色村集体经济“空壳村”占比达80%。为破解发展难题，全市1854个行政村均成立了村民合作社，由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社长，领办创办劳务服务公司等经济实体。

达存村在去年3月组建了劳务服务有限公

司，村委会主任杨宗稳担任公司法人代表。公司具有道路施工、家政服务等40多项服务资质，可多渠道组织村民务工。公司收取用工单位劳务费3%返还给村集体经济。

随着农村改革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深入推进，农村工作日益多元化、专业化，村干部肩负的职责任务越来越重。为激活村干部干事创业动力，百色市在乐业县试行村干部职业化管理，建立报酬有保障、工作有考核、退出有标准的村干部管理制度。

黄运随在乐业县甘田镇复福村做了29年村干部，如今过上“坐班”的日子。“推行村干部职业化后，我们不再‘半工半农’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群众办实事，大家对村‘两委’的满意度也提高了。”黄运随说。

为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，百色创新推出了一系列创先争优工作。去年首次开展的以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为内容的“争创五旗”活动，评出434个“红旗村”，获评村将获得物资补助经费，村党组织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村干部将上调工资。四那村去年获得三面红旗，村党委书记黄国勤说：“通过‘争创五旗’，各村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围，不仅推动了乡村脱贫致富，还带动了乡风民俗转变。”

有为者有位 有位者有为

为了改变部分村干部不作为现象，百色大力开展干部作风整治，让“能者上、庸者下”成为常态。

百色市委组织部部长黄智宇介绍，为激励干部担当实干，百色实施一系列举措，坚持因村选人、精准选派，把熟悉农村工作的干部派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行政村，把熟悉经济工作的干部派到产业基础薄弱的行政村。

去年5月以来，百色提拔重用脱贫攻坚一线干部339人，超过总提拔重用人数的一半；新选派的1845名村党组织第一书记中，大专以上学历占95.56%，平均年龄38岁。每年还按各职务层级第一书记总数20%左右的比例进行择优提拔任用。

除了激励，也有惩戒。在百色2017年的村“两委”换届中，调整不胜任、能力不足、工作不在状态的村党组织书记617人，占总数的33%。

“让有为者有位，有位者有所为，才能让干部迈开步子、甩开膀子，有效破解脱贫攻坚中面临的各种问题。”黄智宇说。

最后的湘江抢渡：信仰的力量



▲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的风凰嘴(6月29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王思维摄



▲全州县城西北角的易荡平烈士之墓(6月29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周华摄



凤凰嘴是著名的湘江渡口，位于广西全州县凤凰镇。渡口不大，一艘简易铁船固定在横跨湘江的铁索上，人们依靠摆渡人拉动铁索过江。

80多年前，最后一批红军在这里渡过湘江。当时涉渡宽约百米的江面，犹如跨越天堑。

生与死之战

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后，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。蒋介石调集重兵，在湘江东岸布下第四道封锁线。红军在11月25日下达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。抢渡中，红军在灌阳县新圩、全州县脚山铺、兴安县光华铺阻击敌军。

12月1日，经过激烈战斗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，然而，国民党湘、桂军已会师湘江边，屏山渡、大坪、界首等渡口相继失守，凤凰嘴成为湘江以东红军各部抢渡的最后一个渡口。

幸存者回忆录中描述，当时正是冬季枯水期，红军指战员们在刺骨的江水中涉行。盘旋在上空的敌机不断轰炸、扫射，敌人从四面八方拥来，炮弹呼啸着落在河滩上，红军战士向对岸冲去，在枪林弹雨中，有的成批倒下，有的被水流

卷走。96岁的蒋济勇就住在凤凰嘴渡口附近，他忘不了当时情景：“两架飞机距离江面很近，不停扔弹，还打机关枪。许多红军被炸死在岸边、江里，有的遗体被江水冲到下游。战争结束后，村民们掩埋红军遗体都理了好几天。”

“上世纪70年代，群众在附近修水渠时，挖出不少红军遗骸。直到去年，我们在江边还发现了一具红军的遗骸。”凤凰镇镇长胡年华说，战后，当地流传着“三年不饮湘江水，十年不食湘江鱼”之说。

湘江战役后，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.6万人，减少到3万余人。

信仰的力量

牺牲如此壮烈。这是一份用生命向信仰交出的答卷。

红三军团第六师之第十八团，是掩护大部队过江的最后的后卫部队。他们与桂军三个师展开激战，终于完成掩护红八军团大部渡江的任务。可是，该团在撤退中被桂军分割包围，战至弹尽粮绝，大部分壮烈牺牲。

没能渡过湘江的红五军团第34师战至弹尽粮绝，全军覆没，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，年仅29岁。红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在此牺牲时，才26岁。红八军团渡过湘江集结时，仅余1000余人。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在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记录了该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莫文骅的故事。莫文骅这样描述抢渡

湘江的情形：最困难的事莫过于在飞机的扫射之下行军，但是我们已不能考虑生命安全了。看到战友们在敌人的射击中倒下，真使人难过，但是，我们相信，飞机能打死打伤我们中的一些人，会使我们的前进更为困难。会夺去一些人的生命，但它们不会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……

一位研究红色文化的学者说，正是怀着建立美好新社会的崇高理想，红军将士才会不惜一切，不惜生命。

未完的答卷

立于凤凰嘴渡口，望着奔流的湘江，记者心潮难平。兴安专家陈兴华说，他接待过许多寻访历史的中外人士，他们都想解答同一个问题：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，在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下，红军靠什么渡过湘江、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？

“关于湘江之战，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更多细节。”他说。

如今，湘江上建起了水电站，高速公路把各县连接了起来。胡年华镇长指着当年红军涉渡处的江面对记者说，那里正在修建一座“凤凰嘴大桥”，预计明年竣工之后，老渡口将停用，依靠人工摇船渡江将成为历史。

他还说，这座桥建成后，将以红色为装饰基调，“虽然渡口不在了，这段红色历史也要一代代传承下去。”(记者朱超、夏军、张瑞杰) 新华社南宁7月4日电